

听，汉学家这样讲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陆培法 文/图

自从1814年法国汉学家勒姆莎在法兰西学院设立第一个汉学课堂开始，学院式汉学专业化的研究至今已经走过了整整200年，作为一门研究中国的学科，汉学在海外经历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汉学、中国文化研究等多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汉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成为数十年来在西方大学的人文领域中增长最快的一门学科。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国文化部邀请了一批当今海外最杰出的汉学家，连续开了两届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今年10月底举行的“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共有34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出席，其中20位知名汉学家来自全球17个国家，在各自的汉学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会后，海外汉学家及中国专家还赴山东曲阜进行文化考察，在孔子的故乡近距离体察中华传统文化，直观感受发展中的当代中国。

这批身在海外、满腹经纶的洋汉学家们所讲述的一个个中国故事，发出一个共同声音：中国在崛起，汉学研究也在日益兴旺。

中国梦，汉学家们心中的世界梦

在本届汉学家们的座谈会上，中国梦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一个热议话题。

埃及前总理、社会活动家伊萨姆几个月前来到北京，曾做了一个关于丝绸之路的发言。在今年的这次座谈会上，他又谈到了中国梦，他深信“一带一路”的计划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触及了中国梦的核心。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理念和计划，实际上是代表了中国、中国人、中国梦和中国文明的特点和精髓。

追溯到18世纪的时候，以及之前，欧洲各国都把中国作为一个楷模和榜样。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上世纪20年代到中国访问的时候，他说中国将在全世界发挥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在科技方面取得了迅猛的进步和发展。伊萨姆提醒大家不要陷入到科技的陷阱中。中国梦要把它理解为两种文明之间的纽带、桥梁，过去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之间的纽带和桥梁。

来自法国的皮埃尔·皮卡尔介绍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以后，从东部走到西部，从南方游到北方，第一次知道了中国和西方媒体报道的中国千差万别。

皮埃尔·皮卡尔说，在17世纪的时候，路易十四国王派传教士到中国，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和法国在文化上、经济上和人文上的交流是无穷无尽的、非常多的。就像法国前总统戴高乐说的一样，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并且有非常独特的、悠久的、深厚的文明。

皮埃尔·皮卡尔说：“我需要纠正目前的价值观，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包含了中国梦、新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当代的中国精神又是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中的。”

来自南非的帕哈德说：“1994年我们成为民主国家以来，我们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迅猛增长，双边的贸易总额去年超过了610亿美元。现在我们已经成为了中国在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这样的关系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和贸易的层面。中国梦、非洲梦、南非梦有着很多共同点，我们都希望打造一个更加和平、更加稳定的世界。”



论坛上，汉学家在发言。

汉学研究，不断追求新高度

家都能够感受到中国文明的发展。

德中协会主席格雷戈尔·保罗在演讲中向人们指出，不能把西方的一些观点用来解读中国的文本，从而得出片面的解读。

格雷戈尔·保罗指出，对于我们这些海外的汉学家来说，中国的世俗主义传统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汉学不应该混淆普遍主义和以偏概全，或者是过度概括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这种过度概括某种层面上来说不应该适用于所有文化的研究，包括中国文化。汉学应该是被尊重的。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常务副主任、欧洲汉学协会理事罗季奥诺夫透露说，最近20年，世界中国研究发生了许多变化。第一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研究的重点从传统领域转到了当代政治和经济领域；第二是汉学家们发展成了大规模的队伍。苏联时期汉语小学主要集中在8所学校。而目前俄罗斯有汉语学的高等学校已经超过了160多所，为苏联时期的20倍。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汉语热仍在持续地升温。比如，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汉语学连续3年是全校最受欢迎的专业，这说明中国现在是在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国家。

杰西卡·罗森女士在发言中，引用了大量中国古代和现代的先进技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希望中国和西方都不要忽视像黄河两岸曾经出现过的非常宏伟的建筑，希望大



汉学家魏扬波（左二）在游览泰山途中学习道教礼仪。新华社记者 贺灿灿摄

当前中国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于国际舞台，世界也正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但遗憾的是，不少西方媒体与学者无法跳脱自身固有的“思维模式”，甚至将其冠以“普世价值”的名号看“中国现象”，讲“中国故事”，最终只能是“南辕北辙”。

而破解这一难题，就离不开对“中国文化”的学习、研究甚至内化，用带着“中国文化”烙印的“中国理念”来讲述“中国故事”。

就像土耳其安卡拉大学中文系主任欧凯在此次2014“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上所讲，一本莫言作品里的“八路”被翻译成“第八大道”，这不只是中文水平的问题，更是文化认知的差异。

而运用“霸权思维”得出中国未来“国强必霸”的结论、用“美式民主”来衡量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这也就是脱离“中国思维”进行思考的做法。

更有甚者，如德中协会主席格雷戈尔·保罗所指出的那样，用西方的一些观点来解读中国的《论语》或《孟子》等文本，总会得出片面的看法。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用“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用“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学会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如果始终将西方文明视为先进，又如何能心平气和地实现跨文明的学习与交流？文化部部长蔡武在开幕致辞中就已指出，中外之间在价值、理念、宗教、艺术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别，这些差别是历史形成的，也构成了世界文化的丰富多样。

用“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还要理解“中国理念”。如文化部副部长丁伟在致辞中所说，当人们谈到中国近年来的变化时，经常说中国经济、政治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最深刻的变化是中国人的变化，中国人思想的变化。

中国人思想的变化诚然有吸收外来文化的部分，但始终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是在坚守本根中走向现代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中华民族传承和为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在当代提倡“和谐、爱国、诚信”等价值理念；中国人民传承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的思想，在当代实践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而中国自古讲究的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更是在刚刚出台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得以深刻体现。

此外，中国还有“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思想。它们都寄托着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崇尚友好的希望，既在当代转化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谐世界”的理念，也落实在中国平等、友好、互助的外交实践中。

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提升，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关注汉学，了解“中国文化”。而他们只有用“中国文化”里的理念来思考观察中国的事情，才能更好地明白“中国故事”，才能更好地向本国人民讲述更准确、更真实的“中国故事”。

“在新的千年中，中国已经发展成为最富有的、最蓬勃兴旺的国家之一。中国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实力使得他国相形见绌，中国传统的哲学理念也成为全世界纷纷效仿的哲学。”美国学者魏杨波说。

“中国并不是一个霸权主义的国家，并不是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的国家。现在中国实施了开放的、共同集体学习的改革过程，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不断融入到政府治理能力提升过程中。”哥斯达黎加的奥尔凯梅耶尔女士说。

莫斯科友谊大学国际新闻学教授尤里·瓦季莫维奇·塔夫罗夫斯基指出：中国对人类文明的文化、历史和物质贡献是不可胜数的。在17到18世纪，凡是由中国传来的事物几乎都在欧洲受到追捧。只是在经历了19世纪鸦片战争和20世纪初一系列屈辱事件后，中华文明才开始受到西方的俯视。这使得不少中国思想家和政治家开始要求摒弃一切传统，即使是现在，很多中国历史学家仍然低估了中华文明对人类的贡献。

据媒体报道，英国博德利图书馆1604年收到第一本中文书，不过直到80年后，才有了能读懂它的人。如今，博德利图书馆的许多中文书有了一个新家：牛津大学圣休学院新建的中国中心里，耗资2100万英镑的中国中心近日对外开放。该中心是受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启发而建，建设的目的用该中心主任拉纳·米特的话说，是要成为“西方世界研究中国的最令人兴奋的场所”，让所有关注中国问题的学者齐聚一堂。

近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英国78%的大学目前提供中文教学。在2010年到2013年间，申请把中文作为唯一荣誉学位的学生人数增加了8%。如今，英国大约17%的公立中学会教学生一些中文，私立学校的比例则高达45%。

尼日利亚《笨拙报》网站最近报道称，有一点可以解释尼日利亚为什么最近爱上了中国普通话，那就是中国经济的繁荣。

当前，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汉学也在日渐升温。北美、欧洲、东亚，不同地区的学者将目光投向中国，他们或沉醉于中国传统的经典文本，或着眼于中国当代发展的各个维度。

据出席本届座谈会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介绍，这几年中，上海举办了五届世界中国史论坛。参加这五届论坛的中外学者一共有1600多人，其中外国学者差不多占50%多。800多人次里面，美国差不多1/4，欧洲差不多1/4，亚洲如果加上港澳台也是1/4。亚洲、欧洲、非洲、澳洲总共占3/4。

黄仁伟透露，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在非洲、中东、中亚、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迅速成长起一批新的研究中国学的外国学者。这批学者对中国的模式、中国的道路、中国的观念有一种特别的钟情，特别的研究热情。所以，这是一批完全不同于过去西方的中国学者。学科已经覆盖了所有社会类学科，甚至自然科学。



汉学家们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参观

了解中国文化 避免「南辕北辙」

柴逸扉